

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程 璆 郑逸芳 许佳贤*

内容提要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越好,女性外出参与社会劳动的意愿越强,但其劳动时间受家庭赡养负担的影响;结构制约方面,家庭人口负担越大,照料压力越重,女性劳动供给时间越少。回归结果还显示,学龄儿童数量和老人数量对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和增加劳动时间投入有正向影响。此外,居住安排对于女性社会劳动供给也有显著影响,其中,主干家庭的正向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对家庭和家人生活的重视,并表明女性面临着家庭照料与工作的时间冲突。

关键词 家庭禀赋 结构制约 劳动参与 劳动时间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越过“刘易斯拐点”(蔡昉,2011),人口红利削弱,劳动力供求矛盾逐渐暴露,劳动供给问题亟待解决。Heckman(1993)认为,劳动供给包括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选择,而劳动参与又可分为工作中和求职中两种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4年的经济活动总人口为7.969亿人,男

* 程璆,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cq9875@126.com;郑逸芳,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zyf1960@126.com;许佳贤,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wxws.82@163.com。

性就业人员高于女性就业人员。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对于家庭与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其就业不仅能提高自身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提升其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另一方面，这对于提高女婴存活率、降低生育率和增加子女教育投资亦有积极的影响（Gleason, 2003；Kalwij, 200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本文关注中国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探讨影响其劳动供给状况的因素，这对于缓解就业紧张及促进家庭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女性劳动供给呈现出明显差异。“大跃进”和“大包干”时期，因政府的鼓励和倡导政策以及家庭解放运动，女性劳动参与率偏高，远超过同期的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而市场化改革期间，受制于性别劣势及老龄化所带来的家庭养老压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劳动供给也明显下降（李春玲、李实，2008）。究其原因，家庭对于个人行为有着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已婚女性在外求职等家庭决策中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禀赋，如家庭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劳动间的选择（石智雷、杨云彦，2012）；另一方面，在代际中心下移的背景下，起初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父子轴关系被横向的夫妻轴所取代，家庭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受到挤压，面临着家庭生产与社会劳动在时间投入上的矛盾。对此，不少学者从古典家庭劳动供给视角给出解释，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即已婚女性在就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等方面与男性差距的日益扩大会促使其主动放弃就业，回归家庭，以更好地实现双方的比较优势（Becker & Lewis, 1973）。但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已婚女性真的是由于丈夫相对收入的提高而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吗？家庭禀赋的强弱和结构制约如何作用于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行为？现有文献对此鲜有回答。

关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研究开展较早。Mincer（1978）发现，截面数据中丈夫的收入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呈负相关；而时间序列数据却表明，在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的家庭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不断地增长。这一矛盾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研究，学者们试图用工资增长来解释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但这种传统的共同偏好模型对于实际工资下降与女性劳动参与反向上升的矛盾却缺乏解释力。有些学者开始寻找除工资与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来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状况。例如，社区环境因素方面，受到外界“拉力”或体验期望，或由于流出地的经济贫困，家庭女性会选择外出；个人

资本方面,教育水平决定个人的工资预期,并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意愿;宏观政策方面,就业帮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女性走出家庭和参与社会工作有促进作用(蔡昉、王美艳,2012);家庭因素方面,子女数量和照料负担(杜凤莲,2008;张川川,2011)、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姚先国、谭岚,2005)、居住安排(Oishi & Oshio, 2006)以及家庭责任意识(Lippe & Dijk, 2002)等因素都会对已婚女性外出就业产生影响。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已婚女性在家庭和就业上的时间分配,或更宽泛的生活时间分配,对女性劳动供给的时间选择方面却缺乏深入研究(杨绪彪等,1999)。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虽然对女性劳动供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家庭层面的研究却较少。多数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上揭示女性劳动供给的总体动态和特征,或针对某一侧面做零散的影响因素分析,或基于某一视角做特定群体的个案研究,但是缺少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综合性的描述与探讨(范红丽、陈璐,2015;佟新、刘爱玉,2015)。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分析了家庭禀赋和家庭结构对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予以实证检验,以期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劳动供给的变动主要源于劳动参与弹性而非劳动时间弹性,换言之,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以及职业选择相较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呈现出更明显的弹性变化。新古典传统家庭理论认为,劳动参与是理性行为人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结果,这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男性劳动供给状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女性劳动供给(Lundberg & Pollak, 1996)。这是由于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已婚女性除参与市场劳动以外,还需要从事家务劳动。一方面,其劳动产出可供家庭中其他成员消费,减少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女性受家庭内在需求的影响,在参与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上存在着时间分配上的矛盾。因此,回归家庭视角来观测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因素,有助于对女性劳动供给状况做出更客观全面的分析与判断。

家庭既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的福利供给单位,它承载着生产、保障、经济扶持和福利供养等多重功能(Stark & Taylor, 1991)。家庭内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外出就业可以保证家庭生产活动的福利最大化。从家庭层面来看,随着现代家庭生

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省力技术与服务业的发展，女性从繁重的家庭生产中得以解放，起初理性的“生产互补模式”被削弱，资源禀赋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而子女数量的减少、两性工资差距的缩短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压力，也反映了赡养负担的加重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因此，已婚女性选择走出家庭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家庭禀赋与结构制约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家庭禀赋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孔祥智等，2004）。家庭禀赋关注的不是家庭中单个人的资源状况，而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是个人禀赋的外延，是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利用的资源总和；与此同时，个人的行为选择还会反向受到家庭禀赋状况和家庭决策的约束（石智雷、杨云彦，2012）。总而言之，家庭禀赋对家庭成员的生产与劳动有着特殊复杂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假设。

假设1：社会资本越丰富，女性参与劳动越积极，劳动供给状况越好。

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规范、互惠信任和关系网络等因素。一般来说，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关系是家庭获取外界支持和关注的媒介手段，社会关系的强弱会影响职业的可获得性和安全性。例如，若夫妻双方为党员，或亲戚朋友中有人在公共部门工作，其家庭成员可能更容易寻得一份非农工作。家庭成员在外务工时通常采用前帮后带的方式，外出或打工的经历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度较强的人通常更乐于接受新的工作职务，并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另外，已有研究发现，女性的社交网络会拓展其求职渠道，其社会兼职和身份特征也会扩大其择业范围（吴愈晓等，2015），而配偶的工作情况能减轻其工作压力或求职负担。

假设2：人力资本越丰富，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度越高，但劳动时间投入并不一定越多。

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年限和培训情况等，是影响劳动参与和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家庭劳动分工不仅要最大化家庭总产出，而且要考虑个人未来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家庭内部分工中运用人力资本分析发现，家庭中关于“谁顾家”和“谁工作”的决策是基于不同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所确定的。通常来说，女性文化程度越高，其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越高；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情况与其文化程度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相关态势，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工作时间投入上会越少，高文化程度人群倾向于选择效率高、回报高的工作。另外，健康状况

良好的女性倾向于参与社会兼职以补贴家用,但有些女性,尤其是农村地区女性的重心仍在家庭照料上(李楠,2009)。

假设3: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越少,劳动时间也越少。

家庭收入状况影响女性的参与社会劳动情况。若丈夫收入足够养家,女性会倾向于以家庭为重而减少社会兼职;而处于社会较底层或家境较差的家庭,女性由于肩负着增加家庭收入的任务,市场工作相对家庭照料会变得更加重要(刘靖,2008)。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资本与劳动供给行为并非单纯的线性相关。有研究发现,家庭财富状况与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人员数呈现“U”型相关,即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家庭,其成员外出务工的倾向更强;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其成员则不愿意外出务工。因此,经济资本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假设4:心理资本与女性劳动参与行为有相关性。

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主要包括乐观、自尊、希望、自我效能、责任感和恢复能力等维度。孝道和家庭主义价值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构成了家庭成员日常互动的基本原则,也成为一种维护和促进以家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韦宏耀、钟涨宝,2016)。

此外,女性的劳动参与还受年老顾虑、养老责任、孩童抚养以及宗教信仰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心理困扰会对女性在家庭照料和劳动就业选择上产生影响,并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时间选择。

(二) 结构制约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文化路径理论认为,观念的变化是影响家庭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而结构路径理论则认为,结构安排是影响家庭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Olsen,1974)。社会与结构因素影响家庭成员的内部分工,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现阶段结构视角主要关注居住模式、年龄结构、生育率、老人和子女数量等因素,居住结构与家庭结构构成了结构路径解释劳动参与的落脚点。基于此,我们提出接下来的假设。

假设5:居住结构对女性劳动参与行为及时间选择会有影响。

居住安排包括居住模式和居住距离两个方面,本文主要观测样本主体的居住模式。在不同的居住模式下,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有所不同。若与配偶同住,夫妻通过互相扶持与分工能减少家庭劳务的时间支出,能换得自身劳动时间的延长;而与父母同住或与子女同住,女性需要担负较多的赡养责任,照料时间会挤占自身的劳动时间;若不与子女或父母同住,其求职可能性会增强,劳动时间也会相对延长,即在赡养负担降低的情况下,已婚女性可能通过给予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以换来工作得心

安理得。因此，居住结构对于女性劳动参与行为与时间选择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影响。

假设 6：赡养负担越大，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越小，劳动时间越少。

由于家庭结构涉及孩子与老人数量，因此，家庭结构会影响女性的赡养负担。女性作为儿童和老人的主要看护者，兼具家庭照料与社会劳动的双重身份，其就业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家庭照料时间的长短和家庭福利的强弱，例如，工作的母亲可能由于缺少足够的育儿时间和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疲惫感而降低育儿质量。通常，老人或子女数量越多，女性越分身乏术，这会影响其参与社会劳动（周春芳，2013），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也改变了家庭结构，这可能加重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

三 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0 年的 CGSS。该项调查始于 2003 年，每年对全国各地 1 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2010 年的 CGSS 对全国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进行抽样，共获得有效样本 11783 个，其中，男性为 5677 个，女性为 6106 个。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情况，所以我们剔除了未婚或同居、分居未离婚、离婚或丧偶的 1269 个女性样本。本文所选样本控制在 18~75 周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0 周岁，以青壮年已婚女性为主。在删除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 1512 个，占女性样本的 24.70%。样本在城乡分布上比较均衡，有 41.53% 的人口为农村户口，58.47% 为城镇户口；样本中有工作的女性占到 60.58%，丈夫有工作的占 77.45%。整体而言，样本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有 72.35% 的女性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65.95% 的人为初中及以下（后文将学历转化为受教育年数）。关于女性的劳动时间选择，本文关注女性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付出的劳动时间，删除缺失值后最终样本量为 777 个，占女性样本的 12.70%，劳动时间长度在 1~72 个小时之间，样本均值为 47.34 小时。

本研究有两个因变量：工作状况与劳动时间选择，分别为二分变量与连续变量。我们分别建立了两个独立的多变量回归模型：女性工作状况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而女性劳动时间选择则采用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在估计模型之前，我们检验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各变量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 均值为 1.85,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横截面数据回归普遍存在异方差问题, 本文采用计算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方式进行统计推断 (伍德里奇, 2006), P 值为 0.685, 排除了数据存在异方差的可能。

(二)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状况, 包括当前工作情况和劳动时间选择两个方面; 自变量包括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度量劳动供给状况的因变量有两个: 目前是否有工作以及每周的工作小时数。在数据处理中, 有关受访者工作经历状况的问题, 我们将其操作为目前的工作状况。其中, 1 表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或务农; 0 表示目前无工作或从未工作过。工作时间为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劳动的小时数。

自变量方面, 家庭禀赋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其中, 社会资本方面的考察主要关注女性的政治面貌、社会信任以及其配偶的工作状况; 人力资本方面的考察主要关注女性受教育年数、健康状况及其配偶的受教育程度; 经济资本方面的考察主要关注不动产方面的情况 (包括房产与家用小汽车); 心理资本方面的考察主要关注对养老责任归属的态度 (包括由子女负责或者政府/子女/老人共同分摊)、宗教信仰以及对自身的年老顾虑。

结构制约主要包括居住安排与家庭结构两个方面。居住安排体现在居住模式上, 分为独居、仅与配偶同居、与子女同居 (核心家庭)、三代同居 (主干家庭) 以及其他居住类型。本文以独居为参照, 考察了各类居住类型对于女性社会劳动供给的影响。家庭结构方面则主要观察 6 岁及以下子女数量、6~16 岁子女数量、同住老人数量、家庭同住总人口 (包括所有与自己同住的家庭成员) 及其中经济独立的人数。这些因素有助于较为全面地考察女性承受的家庭赡养负担。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城乡户口差异和家庭劳动人数 (上一年取得劳动收入的家庭人员)。这里户口差异为虚拟变量, 家庭劳动人数和年龄以连续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劳动供给情况 (样本量: 1512 个)		劳动时间选择 (样本量: 777 个)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工作状况	目前无工作或从未工作过 = 0;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或务农 = 1	0.606	0.489	0.958	0.202
工作时间	连续变量: 小时	/	/	47.340	18.793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劳动供给情况 (样本量: 1512 个)		劳动时间选择 (样本量: 777 个)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家庭禀赋					
社会资本					
政治面貌	群众 = 0; 党、团员及民主党派人士 = 1	0.096	0.295	0.089	0.285
社会信任	不信任 = 0; 信任 = 1	0.652	0.476	0.649	0.478
配偶工作状况	无工作 = 0; 有工作 = 1	0.774	0.418	0.933	0.250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数	连续变量: 年	8.009	4.668	8.180	4.888
健康状况	不健康 = 0; 健康或一般 = 1	0.552	0.497	0.606	0.489
配偶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 0; 高中及以上 = 1	0.351	0.477	0.349	0.477
经济资本					
家用小汽车	没有 = 0; 有 = 1	0.115	0.319	0.125	0.331
房产	连续变量: 套	1.097	0.503	1.126	0.522
心理资本					
宗教信仰	不信仰宗教 = 0; 信仰宗教 = 1	0.135	0.342	0.135	0.342
养老态度	养老不是主要由子女负责 = 0; 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 = 1	0.571	0.495	0.595	0.491
年老顾虑	不担心 = 0; 担心 = 1	0.740	0.356	0.740	0.361
结构制约					
居住安排					
其他居住类型	不是 = 0; 是 = 1	0.017	0.130	0.019	0.138
仅与配偶居住	不是 = 0; 是 = 1	0.346	0.476	0.301	0.459
核心家庭	不是 = 0; 是 = 1	0.546	0.498	0.586	0.493
主干家庭	不是 = 0; 是 = 1	0.024	0.153	0.035	0.183
独居	不是 = 0; 是 = 1 (设为参照组)	0.067	0.251	0.059	0.236
家庭结构					
家庭同住人口	连续变量	2.104	1.360	2.199	1.372
老人数量	连续变量	0.202	0.531	0.246	0.579
6岁及以下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0.171	0.423	0.167	0.416
6~16岁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1.132	0.852	0.609	0.784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劳动供给情况 (样本量: 1512 个)		劳动时间选择 (样本量: 777 个)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经济独立的家庭成员	没有 =0; 1 个人及以上 =1	0.508	1.130	0.511	1.134
控制变量					
家庭劳动人数	连续变量 (包括自己)	2.261	1.085	2.533	1.025
年龄	连续变量: 岁	45.026	12.906	41.870	10.652
户口类型	农村 (村委会) =0; 城市 (居委会/社区) =1	0.585	0.493	0.506	0.500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2 分别报告了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选择的影响。为了模型的稳健性, 我们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两个维度的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排序由小到大, 0 表示无工作, 1 表示有工作, 回归系数越大, 受访者工作状况越好, 时间投入越长, 整个劳动供给状况越好。

表 2 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变量	劳动参与状况			劳动时间选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家庭劳动人数	0.583 ***	0.522 ***	0.569 ***	-0.324	-0.441	-1.108
户口类型	-1.087 ***	-1.296 ***	-1.268 ***	-0.742	2.974	2.991
年龄	-0.058 ***	-0.033 ***	-0.037 ***	-0.113	-0.218 ***	-0.244 ***
家庭禀赋						
社会资本						
政治面貌		0.050	0.101		-4.459 *	-4.924 **
社会信任		0.026	0.019		1.251	0.738
配偶工作状况		1.214 ***	1.147 ***		-1.393	-0.992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数		0.046 **	0.037 *		-0.621 ***	-0.628 ***

续表

变量	劳动参与状况			劳动时间选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健康状况		0.096	0.116		-2.379	-2.003
配偶受教育程度		0.102	0.111		0.734	1.127
经济资本						
家用汽车		0.063	0.091		-0.684	0.120
房产		0.063	0.053		0.414	0.347
心理资本						
宗教信仰		-0.329 *	-0.326 *		-4.351 *	-4.406 **
养老观念		-0.009	-0.029		0.222	-0.097
年老顾虑		-0.366 **	-0.390 **		1.434	1.403
结构制约						
家庭结构						
家庭同住人口			-0.181 **			-0.299
老人数量			0.016			3.805 **
6岁及以下子女数量			-0.407 **			-5.99 ***
6~16岁子女数量			0.217 **			2.217 **
经济独立的家庭成员			-0.085			-0.271
居住模式						
其他居住类型			0.453			5.377
仅与配偶居住			0.582 **			5.420 *
核心家庭			0.635 *			4.251
主干家庭(以独居为参照)			1.140 *			4.159
常数项	2.472 ***	0.378	0.253	53.279 ***	62.774 ***	59.057 ***
伪 R ²	0.174	0.211	0.221	0.004	0.038	0.064
样本量	1512	1512	1512	777	777	777
F 值	190.060	250.660	277.530	0.904	2.332	2.499

注：*、**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一) 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有重要影响。首先，在劳动参与状况方面，家庭禀赋越好，女性参与劳动越积极。其中，社会资本与人力

资本能正向地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心理资本则对劳动参与有负向影响,而经济资本的影响则不显著。社会资本中,配偶的工作状况会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若丈夫工作稳定,为了改善家庭状况,女性也愿意参与社会劳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年数越长,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经济资本方面,家用汽车和房产等家庭不动产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心理资本方面,信仰宗教的女性可能会由于教义束缚或宗教活动的时间需求,较少地参与社会劳动;另外,由于对自己年老时生活状态的顾虑与担忧,已婚女性可能更愿意支持或配合其他家庭成员的生产生活,而非亲自参与社会工作。在结构制约方面,家庭同住人口越多,需要女性照料的人越多,女性赡养负担越重,女性越难以有机会参与到社会劳动中。这种影响又较为复杂,通常低龄儿童越多,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越会受到制约;若孩子处于学龄阶段,女性可能为了保证其教育投入和成长花销,会增强自身社会劳动参与;老人数量对劳动参与影响则不显著。在居住模式的选择上,以独居为参照,仅与配偶同住、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这3种居住模式都正向地影响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其中,主干家庭对于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影响系数最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会对其劳动参与产生正面的激励。

其次,在劳动时间选择方面,家庭禀赋与结构制约对于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选择的影响较弱,在部分变量上还会与上述劳动参与状况的回归结果发生冲突。我们发现,人力资本正向地影响女性求职,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外出劳动的可能性越大,但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每周劳动时间反而会减少0.628个小时。另外,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女性而言,由于教会活动的时间需求,劳动投入时间明显缩短。数据显示,有宗教信仰的女性比不信教的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少4.264个小时。在结构制约方面,6岁及以下子女数量对于女性劳动时间有负向影响,而6~16岁子女数量和老人数量则对女性劳动时间选择有正向影响。每多1个6~16岁子女,女性劳动时间则会增加2.217小时。对于这一关联,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学龄段的子女日渐成熟或通过长幼帮扶,减轻了女性的照料负担。而每多1名老人,已婚女性的劳动时间会延长3.805个小时。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老年人彼此间的生活扶持会相对减少女性的时间付出。此外,与独居相比,与配偶同住能延长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总的来说,已婚女性虽然更倾向于照顾家庭,但若迫于生计而外出劳动,也会为了自身未来养老的需求而增加劳动时间,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换得晚年生活的稳定。综上,假设1、2、4和5得到验证,而假设3和假设6则不成立。

最后,在控制变量方面,家庭中劳动人数越多,女性越可能参与就业,但对时间

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就户口类型而言，城镇女性相较于农村女性参与劳动的积极性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城镇相较于农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便利的求职渠道，农村女性则多以务农和小成本的个体户经营为主。在年龄变量上，年龄的增长对女性参与就业和时间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 老人数量、户口类型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全样本回归中，老人数量及6~16岁子女数量对于女性劳动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预期假设相悖。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根据户口类型进行分样本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样本中以家庭中“无老年人”为参照组，家庭中有1个老年人相比有2个老年人时，女性会多出3.261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这说明，老年人彼此的生活扶持能减少女性的家庭照料时间，从而延长自身劳动时间。另外，城镇样本中，6~16岁（学龄）子女数量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和时间选择有正向影响。可见，相比农村，城镇学龄子女的彼此照料能显著减少母亲的照料负担，同时教养成本的增加也可能刺激母亲外出工作并增加其劳动时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数据结果也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下老年人及其子女生存状况的差异，农村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留守儿童或失能老人的现象，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与重视。

表3 老人数量、户口类型与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变量	劳动参与		劳动时间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农村样本	城镇样本
1个老年人	0.247 (0.416)	0.471 (0.387)	14.049*** (4.022)	-0.329 (0.929)
2个老年人(以无老年人为参照组)	-0.281 (0.525)	0.778 (0.518)	10.788* (5.505)	2.957 (0.529)
老年人数量	-0.065 (0.253)	0.407* (0.247)	7.386*** (2.603)	1.212 (2.092)
6岁及以下子女数量	0.085 (0.260)	-0.886*** (0.250)	-8.063*** (2.941)	-2.602 (2.452)
6~16岁子女数量	0.113 (0.145)	0.432*** (0.134)	1.497 (1.486)	4.576*** (1.450)
样本量	627	884	383	39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2个老年人”的分样本剔除了“3个老年人”的观测值。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CGSS2010 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家庭禀赋和结构制约对中国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越好,女性参与劳动的意愿越强。女性的劳动时间受制于家庭赡养负担,家庭人口越多,照料压力越重,劳动时间投入越少。回归结果还显示,学龄儿童和老人数量对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和时间投入有正向影响,居住安排也证实家人对于已婚女性的社会劳动供给有积极影响,这也侧面说明了女性对家庭和家人生活的重视。

本研究认为,已婚女性外出参与社会劳动不仅与个人特质有关,而且是家庭共同商议与决策的结果(刘兴花,2015)。当前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双重困境(黄枫,2012),家庭养老和劳动供给问题都很突出。已婚女性由于肩负了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责任,面临是否参与社会劳动以及时间选择上的矛盾,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对原有家庭结构的重塑,削弱了当下家庭提供非正规长期护理的能力。已婚女性通常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与老幼育养负担,其劳动时间受到明显挤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整体下降趋势,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

为缓和已婚女性在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从两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一方面,来自家庭成员同一代和代际间的相互扶持能有效缓解已婚女性的日常照料负担和心理压力,例如,角色代偿意识的培养、夫妻间家务劳动的合理分配以及老年人对幼龄子女的隔代看护。另一方面,来自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公共政策和服务会缓解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消极状况。我们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老年人和儿童的照料、赡养、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并关注低收入家庭的老年照料诉求,让每个家庭都“居有定所、子女有学上、老人能颐养天年”,从而解决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应当积极推动家政服务业和心理咨询业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子女看护、老人照料和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和规范化,在增加已婚女性社会劳动时间投入的同时,也能保障幼龄子女和老年人的日常照料。此外,我们应当尝试引入弹性工作制,尤其是对处于孕哺期的已婚青年女性可实行较为灵活的弹性工作制,如半日工作制等,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变量仅仅是从问卷中选用的代理变量,未能使用精确的测量方法,而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当时的情况,未能有效地反映其因果关系和

未来趋势。另外，本文只讨论了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与时间选择，虽然着重考量家庭层面的影响，但是未能考虑女性配偶方的综合因素。因此，本文未能探究家庭决策背后的逻辑过程，未来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发生机制做详细的考察与探讨。

参考文献：

- 蔡昉(2011)，《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第6期，第3-7页。
- 蔡昉、王美艳(2012)，《中国人力资本现状管窥——人口红利消失后如何开发增长新源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4期，第56-65页。
- 杜凤莲(2008)，《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来自中国非农村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第1-12页。
- 范红丽、陈璐(2015)，《替代效应还是收入效应？——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1期，第91-98页。
- 黄枫(2012)，《人口老龄化视角下家庭照料与城镇女性就业关系研究》，《财经研究》第9期，第16-26页。
- 孔祥智、方松海、庞晓鹏、马九杰(2004)，《西部地区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第12期，第85-95页。
- 李春玲、李实(2008)，《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94-117页。
- 李楠(2009)，《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联合决策模型及政策含义》，《人口与经济》第1期，第46-50页。
- 刘靖(2008)，《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经济研究》第9期，第136-149页。
- 刘兴花(2015)，《性别视角下已婚女性赴日打工家庭策略研究》，《青年研究》第6期，第82-90页。
- 石智雷、杨云彦(2012)，《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社会学研究》第3期，第157-181页。
- 佟新、刘爱玉(2015)，《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96-111页。

- 韦宏耀、钟涨宝 (2016), 《代际交换、孝道文化与结构制约: 子女赡养行为的实证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144-155页。
- 伍德里奇 (2006), 《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吴愈晓、王鹏、黄超 (2015), 《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学研究》第6期, 第122-144页。
- 杨绪彪、赵俊艳、周学馨、姚平 (1999), 《中国15~64岁组女性生活时间分配研究》, 《人口与经济》第5期, 第36-41页。
- 姚先国、谭岚 (2005),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 《经济研究》第7期, 第18-27页。
- 张川川 (2011),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第5期, 第29-35页。
- 周春芳 (2013), 《儿童看护、老人照料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 《农业技术经济》第11期, 第94-102页。
- Becker, Gary & Gregg Lewis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2), 279-288.
- Gleason, Suzanne (2003). Publicly Provided Goods and Intra-family Resource Allocation: Female Child Survival in Indi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1), 71-85.
- Heckman, James (1993). What Has Been Learned About Labor Supp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2), 116-126.
- Kalwij, Adriaan (2000). The Effects of Female Employment Status on the Presence and Number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2), 221-239.
- Lippe, Tanja van der & Liset van Dijk (2002).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Women's Employ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221-241.
- Lundberg, Shelly & Robert Pollak (1996). Bargaining and Distribution in Marria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4), 139-158.
- Mincer, Jacob (1978).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5), 749-773.
- Oishi, Akiko & Takashi Oshio (2006). Co-residence with Parents and a Wife's Decision to Work in Japa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y*, 5(1), 35-48.
- Olsen, Nancy (1974). Family Structure and Socialization Patterns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6), 1395 – 1417.

Stark, Oded & Edward Taylor (1991).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igr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Working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 pp. 20 – 25.

Family Endowm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Evidence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of 2010

Cheng Qiu, Zheng Yifang & Xu Jiaxi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of 2010,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ndowment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the labor supply of married women. This paper finds that family endow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to the labor force, although domestic care tasks may limit their working time. In terms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 since care tasks usually increase with family size, women's labor supply and working time are limited as their family burden grows. The regression result also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school-age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may positively impac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to the labor force and their working time. In addition, accommodation also has an obvious impact on women's labor supply. In particular, the stem famil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to employment. It means that women generall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on family life and experience conflicts between domestic care and employment.

Keywords: family endowm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labor participation, working time

JEL Classification: D13, J2, J22

(责任编辑：王永洁)